

《人民至上：中国共产党百年奋进丛书》专题笔谈之十六 | 中国共产党百年国际观研究

中国共产党百年国际观的思想航标作用

■ 陈东晓



成果介绍

中国共产党的国际观是党的思想理论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在谋求民族独立和复兴、引领国际关系正确发展方向的伟大征程中,通过系统化理论总结所形成的关于国际局势的总体立场、观点和方法,涉及国际体系演变规律、国际格局基本特征、国际关系和政党关系基本准则、中国国际定位等诸多方面。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遵循马克思主义国际问题基本原理,将强烈的民族复兴意识和宏阔的国际视野相结合,形成了一系列具有鲜明立场的国际关系思想和理论,并随着时代变迁不断提出具有现实感召力的方案和主张。全面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的国际观,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够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民族独立,能够在风云激荡的国际变局中提高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能力,并不断推进人类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崇高事业。围绕上述认识,本课题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概述国际观的理论渊源、实践基础和主要特点。接下来依次分析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国际观的主要特点及其对党和国家对外工作的指导。最后一部分在总结百年国际观及其实践的基础上,结合动荡变革期国际形势新的变化,就推进国际观创新发展的努力方向展开思考。

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历程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国际问题基本原理,将强烈的民族复兴意识和宏阔的国际视野相结合,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国际观,不仅指导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不断取得胜利,而且作为中国特色外交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时代为推进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发挥着精神底气和思想航标的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认识世界发展大势,跟上时代潮流,是一个极为重要并且常做常新的课题。准确把握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既是党和国家制定方针政策的基础,也是统一思想和行动的前提。百年国际观是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体系中的宝贵精神财富,需要从历史纵深、思想渊源、实践推进、理论深化等多个视角不断加深理解。

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国际观以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思想理论作为哲学基础和根本指导,并充分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世界优秀文明成果中的有益成分。这些思想渊源使中国共产党在分析和处理国际问题时具有相当强的先进性和正义性,例如注重把握世界大势和国际潮流、辩证看待形势发展、强调与时俱进、不断推进国际秩序朝着公平公正的方向发展等。同时,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百年来所形成并不断丰富发展的国际观,不仅来自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政府与其他国家的外交关系,即政府外交的丰富实践,而且来自于中国共产党与其他国家的政党及国际政党组织的关系,即政党外交或政党外交的丰富实践,包括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互动。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国际观脉络的实践来源。

如果要比较完整、准确地认识中国共产党国际观的思想渊源、历史演变、特征范式、立场原则及发展方向,就需

要以百年历史时间为轴,以重大事件及政策调整为纬。党的国际观并不是空想的理论,而是以中华民族谋求独立和复兴的不同历史时期的国情和世情为基础,其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服务于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和总体战略。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国际观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国际观以谋求民族独立为核心目标,形成了鲜明的反对帝国主义的立场和主张,面对日本的侵略,号召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反对法西斯侵略的民族和国家团结起来结成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此外,党中央将中国革命视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确立了处于战争和革命时代的国际观。第二个阶段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的国际观围绕维护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而展开。首先是延续了关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总判断。其次是旗帜鲜明地反对霸权主义,在国际舞台上提出和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及“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第三个阶段是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新时期,党中央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总方针,国际观也相应发生重大调整。党中央作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重要判断,并以此为基础超越意识形态藩篱,积极融入国际体系。此外,认同和支持世界多极化趋势,辩证看待多极化国际格局演进的必然性和曲折性。第四个阶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国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全人类和平发展事业及世界共同发展目标相结合,展现出宏阔的全球视野、坚定的大国担当和博大的历史胸襟。面对世界经历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共产党更加强调全面、辩证、系统地把握

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展现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坚强意志。

百年国际观是我们理解中国共产党思想体系特色的一把钥匙,尤其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首先,自觉把握世界潮流、顺应世界大势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国际观的鲜明特征。正所谓“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正确处理中国和世界的关系,是事关中国共产党事业成败的重大问题。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谋求民族独立,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中,始终自觉地把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相互结合起来考量和谋划,把国内新民主主义革命同世界革命进程相互结合,把社会主义建设、推进改革开放事业同维护世界和平发展、推动开放型世界经济体系相结合,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贯彻新发展理念 and 推动高质量发展,同致力于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的目标相结合,并不断审时度势、与时俱进地调整国内战略和政策,以充分调动国际积极因素来促进民族复兴伟业,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强调的“因势利导、顺势而为”的鲜明的历史观和世界观。

其次,独立自主、平等相待始终是中国共产党国际观的基本底色。独立自主、平等相待来自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谋求民族独立、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施改革开放的百年实践、艰难探索和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总结。百年的历史征程昭示出,各国国情不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没有固定的模板和道路可复制,必须按照各自国情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道路,同时在国际上相互尊重各自人民选择的发展道路和制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坚定

不移走自己的路,就是遵循了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切感悟,是中国共产党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强调平等相待,也是基于各国、各党在国际关系和政党关系上相互尊重对方国家和政党的道路选择和制度设计,为坚持国际关系中的主权平等原则和政党关系中“不干涉内部事务”“求同存异”“互学互鉴”等原则奠定了基础,展现了守正创新、重理尚义的大国气派。

再次,公平正义、互利合作是中国共产党国际观的根本诉求。无论在革命和战争年代,还是在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强权政治、反对党际关系中的“老子党”作为处理国际关系和政党关系的基本准则之一。中国共产党人相信,讲公道话、办公道事是中国在国际上的政治分量不断提高的重要途径。当前,中国共产党把反对霸权主义、支持多边主义和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作为推进国际公平正义事业的中心任务。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国际上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凌主义等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破坏,面对包括全球气候变化、重大传染病流行以及各种分裂和恐怖主义活动等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和挑战,中国共产党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主张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体现了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为推动世界公平正义、互利合作事业作出更大贡献的历史使命和百年大党的担当,展现出立己达人、包容开放的世界情怀。

(作者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

专家点评

从“和为贵”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 王公龙

中国共产党是具有世界眼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其国际观的基本思想就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贯穿其中的核心价值就是“和为贵”。无论在革命、建设、改革的何种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都始终立足于“和为贵”的价值追求来制定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并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国际观的鲜明特色和独特品格。

“和为贵”是中国共产党国际观的传统基因。“和”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和衷共济”“和实生物”“和而不同”等价值理念的核心元素就是“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和平、和睦、和谐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来一直追求和传承的理念,中华民族的血液中从来没有侵略他人、称王称霸的基因。”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华民族不仅秉持“和为贵”的思想来调节社会内部的各种尖锐矛盾,而且以“和为贵”的理念处理与外部的各种复杂关系。中国共产党是立足中华大地、流淌着中华文化血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注重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中汲取思想营养,从“和为贵”的理念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并在对外关系的实践中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

“和为贵”是中国共产党制定国际战略方针的核心价值追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依据“和为贵”的理念调整对英美等西方国家政策,加入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为反对法西斯侵略,争取世界和平作出重大贡献;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提出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把“和为贵”的思想首次运用于新中国的外交实践中,积极处理好与周边国家及第三世界国家关系,并努力使之成为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依据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基于“和为贵”的价值追求,中国共产党制定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积极开展全方位外交,主动融入世界

经济体系,致力于为中国改革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积极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和为贵”的理念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出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一系列中国理念和中国方案,致力于为世界和平发展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和为贵”是中国共产党国际观的内在品格。经过百年的持续探索尤其是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的对外关系实践,“和为贵”理念不仅成为中国共产党十分珍视的价值理念,而且已经内化为中国共产党判断国际大势、擘画外交战略、贡献世界和平发展的高度自觉意识,成为中国共产党国际观的鲜明特色和独特品格。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依然是时代主题,但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不

稳定性和不确定进一步增加。无论是破解全球治理的难题还是处理好各种复杂的国际关系,“和为贵”都是中国共产党不竭用之不竭的宝贵思想资源。基于“和为贵”理念,中国共产党将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将推进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中,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历史已经证明:“和为贵”理念赋予了中国国际观以丰厚的文化滋养和核心价值支撑;历史还将证明,“和为贵”理念必将对中国共产党国际观的创新与升华产生更为强大而持久的推动力量。

(作者为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副秘书长,中共上海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

人类情怀与国家立场的高度统一

■ 王健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以宏大的国际视野,不断深化对外部世界的认识,不断探索、调整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定位和相互关系。习近平总书记从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一百年的奋斗中,我们党始终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把握历史大势,正确处理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善于抓住和用好各种历史机遇。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坚持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另一方面高瞻远瞩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了人类情怀与国家立场的高度统一。

任何一个国家特别是大国的执政党都必须面对如何处理本国与世界关系的问题。有的国家试图把自己的崛起建立在对其他国家的征服与掠夺的基础之上,如近代以来到处抢占殖民地的西方列强和二战期间的德、日法西斯。有的国家一直在实现本国利益与承

担国际责任徘徊,一旦有冲突就以孤立主义的面目把本国利益放在第一位,二战结束后建立了世界霸权的美国就是如此。鉴于这些教训以及长期以来中国与外部世界相处的经验,当代中国共产党同时提出推动中华民族全面复兴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其中包含了对党、对国家、对国际关系的深刻思考。

首先,共产党作为最早倡导“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政党,有着联结国家与世界命运的先天基因。自从马克思、恩格斯起草《共产党宣言》开始,共产党人从来就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而是始终关注整个人类社会的前途。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实践之后,国际主义一直是社会主义国家高举的旗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对外关系不以意识形态划线,全方位地同所有国家开展交往。当前,中国共产党既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也致力于为人类进步事业

奋斗,同时,继承前人基因,在新的时代环境下致力于实践国家利益与人类前途的高度统一。

其次,中国作为人口占世界近五分之一的新兴大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根本前提。人类是包括不同文明、种族和国家的共同体,只有每一个国家实现富起来、强起来,才能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打下坚实基础。中国作为近代史上积贫积弱的人口大国,成功地实现全面脱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本身就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贡献。与此同时,富起来、强起来的中国正在不断为世界和平、繁荣与发展作出贡献,成为坚决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坚力量。今年7月6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以视频连线方式出席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并发表主旨讲话,强调在人类追求幸福的道路上,一

个国家、一个民族都不能少。世界上所有国家、所有民族都应该享有平等的发展机会和权利。

最后,为了摆脱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间的“修昔底德陷阱”,必须以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保障。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不能不正视当前仍然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就不能不注意到新环境新时代下大国之间必须争取和平共处。为此,中国共产党在外交方面提出建立以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为特征的新型国际关系,同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大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同包括周边在内的世界各国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可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破解“修昔底德陷阱”的最优解,也是在互利共赢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

身份决定行为,国际身份影响国际决策。提高我国的外交话语权和在国际社会传播好习近平外交思想,向世界阐明中国的外交政策立场,就必须用国际社会听得懂的语言讲清楚中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国际身份。

首先,要明确国家身份、国际身份和基本国际身份的逻辑定位。所谓国家身份主要是由国家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等决定的身份定位,属于国内意义的政治社会学范畴。所谓国际身份主要是指主权国家在国际社会中比较稳定的角色定位,它是建立在自身力量、国家利益、国际使命、国际承认、国际实践等因素基础之上的国际行为立场,属于国际意义的国际政治社会学范畴。正如现代社会的个人拥有多种身份的同时总有基本的身份和其他身份,现代国际社会任何主权国家也拥有基本的身份和其他身份。进入新时代,中国的基本国际身份大致可以表述为:有全球治理使命的最大发展中国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的身份,主要属于国家身份的范畴而不是国际身份的范畴。国际身份与国家身份密切联系,受到国家身份的有力影响,但又有其自主性。正确地区别国家身份与国际身份,有助于我国批驳霸权国家的双重标准外交和价值观外交,也有助于向国际社会阐明,不当把国内制度拿到国际政治中说事,国家之间应当尊重不同国家人民选择适合自己国情的国家制度和国家身份。

其次,要坚持“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身份的政治定位。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迅速提升以及美国等国实力的相对衰落,国内和国际上关于中国是否仍为发展中国家的身份界定争议不绝于耳。从经济总量上讲,中国在不计指标上已经达到了发达国家的水平,这是事实。然而,中国在更多的人均指标上尚未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因此我国才有了2035年、2049年等节点的现代化宏伟目标。更重要的是,发展中国家也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概念,它还包含了政治立场、文化建设和历史传统等方面的因素。中国70多年来一直坚持第三世界和发展中国家的立场,让自己的命运紧紧地与发展中国家联系在一起。脱离了发展中国家这个基本身份,中国就脱离了国际社会的最大多数,因此这个身份定位是中国和平发展的政治保障。

第三,要重视“有全球治理使命”身份的时代定位。进入新时代,中国的基本国际身份出现了具有历史与时代特点的新内涵。中国不是一般的发展中大国,而是具有全球治理使命的大国,这个新身份一方面是由国家身份决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这个国家身份具有天然的国际主义使命,而在新时代就体现为包括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与建设、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只有这样才能为人类进步事业作出无愧于时代的贡献;另一方面也是由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建构起来的:由于美国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不断收缩,世界上出现了不同议题领域的治理赤字,广大发展中国家甚至不少发达国家都希望、期待和要求中国担负起应有的大国责任,这推动了国际更加实质性参与新型全球治理。

(作者为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向世界讲清楚中国的基本国际身份

■ 郭树勇